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 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雷信来¹

(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片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 重庆 涪陵 408100)

【摘要】: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 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 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 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 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 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 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 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滇藏地区 边疆民族 中央政权 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3-0142-07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是专制王朝关注的重大命题, 时至今日, 这仍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关紧要之事。中国也不例外。对于此命题, 学界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探讨, 产出一大批成果, 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些成果立足各自理论视角, 从多个层面分析了边疆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内在原因、表现形式、强化路径、发展趋势、研究价值等。关于滇藏地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问题研究领域, 廖春华、胡军两位学者全面分析了云南民族团结的所以然之故。^①李根、张晓松对云南各民族的团结的特点、规律呈现和内在原因进行了探讨。^②雷信来在《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一书中, 就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国家认同命题进行了详尽周全的讨论。^③鲍秋媛提出“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达赖集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分裂祖国的问题; 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培植、支持西藏地方分裂分子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问题; 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企图牵制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④赵志认为“3.14 事件”是“多股反华势力联手进行破坏活动”^⑤所造成的。周兴维主张解决西藏问题“既要原则坚定又要方式灵活”^⑥。陈金霞、李大国则具体提出“解决西藏问题, 我们首先必须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立场。”^⑦张云的专著《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西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⑧综合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这些论作在研究对象上以具体个案分析居多, 在研究方法上从宏观视野进行类比分析的很少。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立足于纵向历史层面, 探讨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命题。之所以把滇藏两地区一同纳入研究视野, 一是两地同属中国西南地区, 彼此在地缘环境上紧密相连; 二是两地区与中央王朝关系嬗递的背后缘由存在共性。因此, 有必要把两省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放在一起加以检视, 希冀为当今边疆地区的团结和谐与长治久安提供历史鉴戒。

一、地缘环境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

¹作者简介: 雷信来, 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片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13CMZ010)、长江师范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唐宋王朝的地缘政治与族际关系研究”(2017KYQD92)阶段成果。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其北方、东北方、东方分别是四川、贵州、广西,在地理上与三省区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彼此自古就有水陆道路相交通。借助这些通道,云南与华西、华南及中原地区连接起来。西藏的地缘环境与云南显著不同。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四周的高大山系使其自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单元。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看,相较于云南所处的云贵高原,西藏在地缘环境上位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区,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历史上民族地区或地方政权在地缘环境上与中原政权的亲疏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央王朝与之发展关系的意愿。如果某民族地区或地方政权所处地理位置与中原政权具有很强的亲缘性,中原政权很可能会积极经略这一地区;反之,中原政权会忽略或放弃经营该地区。历史上民族地区或地方政权位于边疆地区的不在少数,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间的交通往往不便,经营这些地区成本高、收益小,这是影响中原王朝经略这些地区的重要因素。

中央王朝如何认识、对待边地民族或政权是一回事,而边地民族或政权怎样考量、措置与中央王朝之关系是另一回事。唐时吐蕃为发展、壮大计,不断把势力向西北、正北、正东和东南方向拓展,于是和唐朝的利益发生碰撞。或许可以这样说,唐蕃关系的建构,更多在于吐蕃的主动作为。青藏高原高峻的地势、寒冷干燥的气候、空气含氧量不足、自然条件较差和对外交通的不便,客观上使低海拔地区的势力向青藏高原的拓展异常困难。而对于吐蕃来说,客观条件的不利却转生成它外向开拓的驱动力。吐蕃选择向中原王朝地区发展,具有地缘上的必然性。“无论从吐蕃东南方向沿三江河道进入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还是从吐蕃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都远没有从吐蕃南部和西部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泥婆罗和天竺以及由北部翻越昆仑山进入中亚和西域那种巨大的地形高差,这表明,吐蕃势力向东发展的地形条件要远比其向南、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地形条件有利得多”^①。盘踞在青藏高原赋予吐蕃开疆拓土拥有居高临下之便。“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即以向外的开拓和发展作为立国之本,并展开了持续达 200 年之久、强有力和全方位的向外武力扩张。吐蕃武力扩张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作为一个高原王朝乃是极为罕见的。”^②换句话说,王朝国家时代,地缘环境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发展,但这类关系发展并不是中央王朝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从地缘环境上说,西藏文明的东渐以及与中原文明发生大规模的际遇,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二、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

云南是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又地处“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云南历史上接纳了大批外地移民,四面八方的人们进入云南,同时把自己的文化捎进云南。南诏大理时期,来自中原的儒释道文化在云南广为流布,南诏大理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熏染,被打上深刻的中原文明烙印,云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由此逐渐生成。元朝统一中国后,云南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程度更加深广,更深刻地融入华夏文化。

唐朝以前,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就不绝如缕地撒播进云南,至唐宋时儒释道文化都在云南铺展开来,并先后与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缘。南诏国早期崇奉道教,借助道教的宣传动员力量统一洱海地区。其后出于更大规模统一的需要,南诏国又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大理国更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南诏大理国引入汉传佛教,是因为到唐时“经过改造的佛教教义具有为现存秩序培养驯服臣民的作用”^③,继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是大一统时代,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云南行省,依然不遗余力地发挥佛教有资于治道的价值。元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儒学更加兴盛。对云南来说,儒释道均属于外来文化,它们各自进入云南都得到尊重和显扬。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政治功能,在云南政治史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历史时期云南地区所以坚定认同中原中央王朝的重要缘由。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演变受到了汉传佛教的重要影响。“松赞干布还资助翻译佛经的工作,传说当时已经译出的佛经有 25 部之多,翻译这些佛经时,每次都有若干汉族僧人参加。”^④文成公主本人笃信佛教,入藏时带去一尊释迦牟尼像和大量佛经。“佛教经典传入吐蕃最多的一次还是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带进来的,我们讲过仅文成公主就带来了三百六十多部。”^⑤文成公主对西藏佛教事业的贡献之大可见一斑。金城公主入藏时同样带入大批佛教典籍,这对于藏地佛教的弘扬起了较大作用。赤德祖赞派人赴汉地翻译《律差别论》和《金光明最胜大乘经》等经典,晚年派遣桑希等 4 人前往中原取经,得到唐朝用金水书写在蓝纸上的佛教经典一千卷。这一行 4 人曾朝拜五台山等佛教圣地,并计划迎请一位汉地和尚赴藏。吐蕃统治敦煌期间,在敦煌建立一所译经院,汉地、西域、古印度和尼泊尔的僧人一道翻译佛经。通过佛教领域的交流,唐蕃之间加深相互认识,为双方和平友好相处提

供前提条件。

吐蕃王朝的势力以东向扩展为主,吐蕃文明亦随之向东渗透蔓延。吐蕃王朝的解体,并不妨碍藏地文明的东渐。从唐末迄两宋,藏地佛教文化向东部的浸润、传播更加广泛。吐蕃时期佛教即已向康区的东部地区扩展,接着传播到西夏境内、川西高原的吐蕃部落、凉州的吐蕃六谷部。“西藏文明在这一时期中的东向发展,使西藏东部外围地区,即包括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地区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在种族与文化上均逐渐与西藏本土趋于一致,使上述地区最终成为了以藏民族为主体的西藏文明圈。”^⑥吐蕃文明的东渐,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西藏文化圈的形成与日渐扩大,为西藏地区走进大一统的元帝国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西藏地区被顺利纳入元帝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蒙元帝国高层对藏传佛教的接受与皈依,为它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藏传佛教不仅获得向蒙古社会传播的良机,而且还拓展到更庞大的中原地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与蒙古帝国差异较大。表面上看,明廷与西藏当局的关系较为松散,但有明一代,黄教的兴起和力量的增强,藏传佛教开始向东北部的蒙古地区传布,逐渐得到广大蒙古社会的承认和崇信。这意味着藏传佛教文化圈向东的大幅度扩充。满清入关后,一直把蒙古贵族作为很重要的辅佐力量,也因为蒙古贵族的熏染,满清对蒙藏社会普遍信仰的喇嘛教形成深刻认识。从努尔哈赤起,满清采取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贵族的政策,随后清朝借助蒙古贵族对西藏宗教势力的巨大影响收复西藏。从元至清“在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过程中,西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蒙藏在宗教文化上发生的深刻联系无疑起了最具决定性的作用。”^⑦此说的理由在于,“西藏文明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高原文明,它与中原以农耕为特色的汉文明之间的确存在一定距离和差异,相反,西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则存在着较大融通性,而同时由于历史上中原汉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两大文明之间的长期交融与碰撞,又使得汉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具有了很大的兼容性。这种格局,也许正是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过程,一般并未直接通过与汉文明的联系来实现,而是通过与之较为接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即通过与蒙古的宗教文化联系来得以实现的原因。”^⑧由此可以进一步发见,是藏传佛教的中介力量把藏文化与蒙汉满文化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这背后的更深刻的理由是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所致。

三、民族“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

云南“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段时间内,在亚洲东、中部战乱的情况下,横断山脉反而成了许多古代民族群体安身立命的‘安乐窝’”。在“秦汉王朝致力于开发边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包括少数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群体,纷纷向西南边疆汇聚,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从而使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⑨云南历史上多次接纳过外来移民。人口的迁徙流动必然会发生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现象(接下来简称“三交”)。在不同民族“三交”初期,因外来人口数量较少,外迁来的民族基本都会被当地民族融合,但这些外来人口所携入的思想观念和 production 生活方式会在当地沉淀下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云南民族众多,各族间的“三交”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云南各族人民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由是进一步巩固,并较早携手走进统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

藏族的起源是多源的。“从宏观的角度看,藏族源于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这三大原始民族系统就是本地的土著民族系统,北方的胡民族系统,东方的氐羌民族系统。”^⑩藏族不仅在族源上是多源的,而且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周边兄弟民族进行“三交”。641年,李唐王朝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随同文成公主入藏的人有其奶母一家、官署及其家属,若干侍女、卫士、医生、工匠和厨役等,他们是第一批入藏而与藏族结合的汉人。松赞干布到柏海迎到文成公主和送婚的队伍时,穿上了唐太宗送上的锦袍,以唐朝驸马的吉服把自己打扮起来。他是第一个穿上汉族服装的吐蕃人。吐蕃时期,因通好、战争、经商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进出青藏高原的各族人群日渐增多,尤其因战争被迫留寓藏地的人口不在少数。这些外来人口进入吐蕃,一方面有助于吐蕃王朝社会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有助于民族间的“三交”和藏族的成长发育。

吐蕃解体后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的青藏高原并未中断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唃廝囉与两宋政治关系就较紧密,多次遣使至宋朝贡,称臣并请求封赐,宋朝积极回应,多次册封唃廝囉王族。唃廝囉地区亦因此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宋真宗曾在1001年加封凉州藏

族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从公元 11 世纪开始,宋朝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 30 多万藏人从事垦种。”⁽¹¹⁾宋朝这类举措无疑加速了当地藏汉诸民族之间的“三交”。至于元明清时期,西藏地区走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列,藏地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三交”愈益深广,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愈为强固,时间越往后延展越是如此。

四、经济交流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

中央王朝主体区域,即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虽因区域辽阔、物产丰饶而呈现经济繁荣景象,但它依然需要与周边地区互通有无。滇藏地区相较于中原地区来说,对外经济交流的必要性及迫切性更强。中原与滇藏地区在经济生活上本具有的互补性使双方很容易走到一起。故从唐至清,滇藏地区与汉地间逐渐结成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主动向中原地区接近靠拢,能使滇藏两地区的物质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这对于滇藏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客观地看,滇藏文明一直存在那种突破自身相对不利的自然环境向外发展的趋势。因此,滇藏地区必然选择向最繁荣昌盛的方位发展。放眼四周,中原汉地正好能够很好地满足滇藏地区对于发展对象的拣择,因为当时中原王朝的富足、繁荣是当时滇藏地区的周边国家不可比拟的。

云南地区在秦汉以前就与内地存在一定的物质交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帝国的力量开通连接今四川宜宾和滇西北的五尺道,并沿该道设官置吏。“秦时常頌略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¹²⁾五尺道的开通,有利于物质流动和人员往来。西汉把云南纳入中央版图,对云南的经营更为深入全面。云南和中原的物质交流有了政治依托,经济生活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更大。随着时间不断延续,不论中原腹地处于和平还是分裂状态,云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均没有中断过。通过与内地连续多年多领域的交流互动,到唐宋时期云南与内地联系的通道更多,也更为便利,经济交流的规模更为庞大。云南与内地经济生活日趋热络的过程,亦是云南的经济生活纳入全国经济体系的历程。到南宋末期,云南的经济生活已经与中原地区不可分割了,这是云南与内地能够结成政治统一体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元帝国的统一,云南的经济生活水到渠成般地融入全国的经济体系,时间越往后,这种情形愈如此。

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亦较早,不过在唐朝以前这种交流是断断续续、不成规模的。唐时吐蕃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文成公主入藏,可以视为汉藏经济交流的特殊形势。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工匠、多种谷物种子和牲畜,沿途教藏民安设水磨、垦田种地等。后来松赞干布从汉族地区引进碾磨、纸墨、农具制造、纺织、建筑、冶金、制陶等生产技术。这些生产技术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朝贡贸易是唐蕃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延续近两百年,和平时期更加频繁。吐蕃使者带来的物品主要是藏金银制品和青藏高原的方物,唐朝对于吐蕃使者秉持厚往薄来的态度,以数量更多、价值更高的贵重物品相赠。如 730 年唐玄宗回赠吐蕃使者紫袍金带、绶綬、银盘、胡瓶和丝绸锦缎等,其中丝绸锦缎是用于馈赠最多,也是最经常的礼物。吐蕃使者除接受唐朝的馈赠外,使团中的有些成员还利用出使之机从事可观的私下交易。唐蕃之间最经常且大量的贸易形式是在边境地区的互市。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有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¹³⁾互市商品除丝绸织物外,茶叶是传入吐蕃的重要物品。另外,边境地区大量零散的民间交易同时存在,它是为弥补官方贸易不足而出现的。

宋朝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和陕西某些地区设置固定市场,与藏区进行茶马交易。赵宋虽忙于应对北方的辽、金、西夏、蒙元,但与青藏高原的经济联系不但没有中断,反而继续发展着。双边的茶马交易依然活跃,交易的形式大概有三种:一是传统的朝贡贸易。卫藏各地方割据首领根据各自需要遣使向宋王朝进贡土特产,宋朝则回赠更多价值更高的物品。二是通过民间的茶马互市进行商贸交流。三是宋廷因战争的需要,在边境地区设置专门机构收购良马。从具体交易商品看,输入中原地区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肉类、乳类、酥油、麝香、硼砂、牦牛尾、食盐、白银、玉石、药材和手工业品等。输入青藏高原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纸张、墨、茶叶等。通过这些商贸交易渠道,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的物品实现对流,达到互通有无各求所需之目的。

由元至清,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因具备可靠的政治保障而更加频繁,规模亦更庞大。西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物产寡淡,自身出产的物品远远满足不了世俗贵族和宗教集团的需求,因此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必然具有向外交易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只可能来自中原地区。为实现这一需求,西藏上层采取让渡政治权力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模式。元明清接续顺利实现对西藏的统治,

即是这种模式的生动实践。元朝入主西藏,西藏僧俗阶层凭借元帝国的政治支持,从中原地区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西藏经济形成必须依赖中原王朝的经济力量给予支撑的发展模式。以后的明清时代,西藏与中原的经济关系也大抵如此。“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极度依赖,构成由元迄清时期西藏不断主动趋向中原政权的强大内驱力,这是促使西藏地区走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五、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中央王朝对云南地区的行政管辖始于秦汉时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朝曾经在今川西南和滇西北设官置吏,对这些地区进行行政管理。从公元前135—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相继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越嶲郡和益州郡。三郡的设立,把西南夷大部分地区纳入西汉的行政管理之下。69年东汉王朝在西汉经略的基础上,在今滇西地区设置永昌郡。至此,西南夷地区基本被摄收进中央王朝管辖范围之内。随后中国历史进入混战割据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地方政权为发展壮大计,曾积极统辖、开发过云南地区。如蜀汉政权在越嶲、牂牁郡、永昌等地设置官署,后在今临沧和西双版纳地区设治。南朝的刘宋政权在今云南曲靖设宁州,管辖十五郡,统辖范围大致是今云南、贵州两省,还在益州郡治下设置越嶲郡。隋朝建立后,在隋文帝主导下,在昆明一带设置昆州,在曲靖设南宁州总管府,以羁縻之制和恩威并用的策略治理这些地区。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个大一统的鼎盛朝代,它的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认识和措置相比以往朝代,提升到新的高度,随之的行政管理活动不断加强。唐太宗坚持“四海如一家”“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等开明认识,制定、实行切实有效的治边之策。“安史之乱”前,李唐皇室大抵能遵循这类认识,沿用太宗的治边之策。唐朝对云南的管辖采取“以滇东北和滇中为突破口,逐渐向滇西等地推进”^{〔15〕}的策略,“注重招抚云南当地民族,广泛任用其首领担任羁縻州的官吏。”^{〔16〕}“天宝战争”爆发前,“唐朝在除今滇西北和澜沧江、怒江中下游区域以外的云南广大地区”^{〔17〕}建立起广泛的行政管辖区域。唐以前的云南地区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是唐朝的积极干预与大力扶持,使南诏逐渐统一云南。在唐朝有效施政基础上,南诏国和唐王朝间不仅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而且终南诏一代对唐王朝的认同日渐提高。继南诏衣钵的大理国是与两宋并存的地方政权,在与宋朝搭建政治关系方面,大理国态度积极,多次遣使至宋,请求内属,要求册封。与大理国主动态度和积极作为相较,两宋对大理国的态度摇摆不定,对北部战事的屡次失利,致使两宋后期把大理国视为外藩。尽管两宋一再冷淡疏远大理国,但大理国仍一再向两宋进贡,表达臣属愿望。大理国在存续时间内非但没有与两宋发生过一场战争,而且还自觉履行方国拱卫中央的职责,比如派将军高禾领兵抵御蒙古大军的进攻,此役高禾战死,蒙古军亦退却,使蒙元帝国迂回包抄南宋的计划一度受挫。

蒙元帝国很重视对云南的管理。忽必烈亲自挑选亲王或重臣镇守云南,任命其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后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封重臣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赴滇担任云南行省第一任行政长官。在赛典赤的励精图治之下,云南行省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赛典赤“所推行的一整套完善统治与全面治理的措施,深得忽必烈的赞同,他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陈规‘不得辄改’。”^{〔18〕}元代对云南的行政管理,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看都超越前代,云南行省各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明朝建立后用兵西南,花很长时间和代价才征服云南,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土官为首的各族民众对元朝的政治忠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往昔“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主张积极经略边疆,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朱元璋亲自选定养子沐英为云南总兵官,要求沐英以保境安民为要,慎用刀兵。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明朝在省级实行“三司”制,在地方采取卫所制和土司制,在财政上继承元制开征赋税。明朝对云南地区的治理开发取得很大成效,以此为基础,清朝对云南进行更深广的治理,云南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共同体夯筑的更牢固。清朝依然奉行“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对云南地区的治理和稳定十分重视,对云南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大幅度提高。整个清朝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好于前代,各族人民在边疆与内地一体的认识上更加深刻。

集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松赞干布不仅结束了青藏高原部族分裂的格局,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而且对其东、南、北邻国的富足文明程度拥有极为准确的判断,指出只有东方邻国唐朝才是吐蕃学习、借鉴的榜样。“南方门隅天竺(印度),西方大食、北方突厥、涅麦,均畏服(吐蕃),争相朝贡,俯首听命。”“东方有汉国,地极大海,日出之处,其国君与南面泥婆罗(尼泊尔)等国不同,教善德深。”^{〔19〕}这是迄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上的一段文字。正因为吐蕃对唐朝的钦佩重视,驱使吐蕃不惜采用文武并用策略,以学习、借鉴大唐文明。唐蕃关系不论是和平友好,抑或是兵戎相见,都是吐蕃东向发展

战略的具体呈现。诚然吐蕃不是唐朝的臣属国,但吐蕃的东向发展战略预示着藏地将会走进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

两宋时期青藏高原处于部族割据状态。1001年,宋朝对凉州六谷部藏族首领潘罗支加封官职。原吐蕃的部族首领唃廝囉建立起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为巩固政权唃廝囉多次遣使纳贡于宋廷,请求册封官职,宋朝于1032年和1041年先后两次册封唃廝囉,此后唃廝囉的继承人均受到宋朝册封。从宋代开始,“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的唃廝囉、潘罗支等藏族地区,已经开始隶属于中国宋朝。”⁽²⁰⁾这些地区虽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区域,却为后来青藏高原以一个整体加入蒙元帝国打下坚实之基。

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相继而立的大一统王朝。从元朝始西藏被纳入中央王朝统辖下,成为元帝国的一部分。元帝国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西藏各项事务,在西藏地方设置三司分别管辖藏地三个行政区域。明朝通过发诏谕、接受入朝、封授官职等方式,很快使元时藏区各地的政教首脑臣服,把整个藏区置于其统辖治下。明朝在中央政府恢复设置鸿胪寺,主管少数民族事务。在藏地实行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先后封三大法王和五个王。对西藏的具体治理,明朝采取“众建多封、贡市羁縻”的政策。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和具体施策,“完善了明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的行政建制,极大地增加了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民族凝聚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²¹⁾满清尚未入关时,达赖喇嘛已与皇太极建立朝贡关系。清朝建立后在中央朝廷设置理藩院,执掌蒙古、西藏、回部等少数民族事务。1652年顺治帝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册封,确立其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认可顾始汗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权力。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1793年清朝正式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务进行改革与规范。《钦定西藏章程》以法律形式确定清政府对西藏的统辖权,明确清朝对西藏的隶属关系,这对于藏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强化藏区人民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滇藏两地与中原地区在地缘上的亲缘关系创造了滇藏地区亲近中原政权的自然环境。滇藏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通过鉴别主动选择向中原文化靠拢,形成对中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自然环境上的亲缘关系和文化向心力构成中原王朝吸引滇藏地区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需要实际载体才能转生成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而民族间的“三交”、经贸往来,以及中原王朝对滇藏地区的行政管辖,则适时充当起这个载体。简言之,五大因素合力促成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推动滇藏各族人民走进、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回顾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回味、反思、借鉴都在其中。人类不应该因为拥有今天而割断对于昨天、前天的记忆,其实,我们今天迈出的脚步也会落在往日的足迹之上。”⁽²²⁾历史是现实中存在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助于对历史时期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的考察,可以清晰发现边疆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具体线索。今日之中国,如何强化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怎样调动各民族的力量共建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有益启迪。

注释:

1 廖春华,胡军:《多样、宽容、和谐的文化与民族团结——云南民族团结问题思考》,《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3页。

2 李根,张晓松:《云南民族团结的特点、发展规律及成因探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3 雷信来:《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68~201页。

4 鲍秋媛:《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看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理论导刊》2004年第12期。

5 赵志:《对“3.14事件”以来“西藏问题”的回顾与反思》,《阴山学刊》2009年第2期。

-
- 6 周兴维:《解决“西藏问题”的柔性思考》,《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
 - 7 陈金霞,李大国:《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对策》,《阴山学刊》2006年第3期。
 - 8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 9 石硕:《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性特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 10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 11 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2~73页。
 - 12 安应明:《吐蕃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 13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 14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3页。
 - 15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3页。
 - 16 王文光,尤伟琼,张媚玲:《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 17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 18 王家伟,尼玛坚赞:《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 19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5页。
 - 20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3页。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 22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 23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 24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 25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 26 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西藏简明通史(上册藏文本)》,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 27 王家伟,尼玛坚赞:《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8 向燕南, 罗炳良, 王东平:《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 3 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33 页。

29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5 页。

30 张云:《多元一体国家中的西藏》,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89~155 页。